

青年学术丛书·哲学

YOUTH ACADEMIC SERIES-PHILOSOPHY

生态实践论

陶火生 著



人民出版社

青年学术丛书·哲学

YOUTH ACADEMIC SERIES-PHILOSOPHY



生态实践论

陶火生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杨文霞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实践论/陶火生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

(青年学术丛书)

ISBN 978-7-01-011250-3

I. ①生… II. ①陶… III. ①生态环境-环境保护 IV. ①X1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8356 号

生态实践论

SHENGTAI SHIJIAN LUN

陶火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330 千字

ISBN 978-7-01-011250-3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著作由福州大学人才启动基金和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序

陶火生博士在攻读学位期间,有志于研究“生态实践”问题,本书就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成的。

随着工业文明危机的扩展和加深,建立在这种文明基础上的哲学观念也将陷入危机。与人类社会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新的哲学——生态哲学也随之产生。当前,关于生态哲学的研究,在译介西学、深挖传统思想资源、开发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证化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重大的理论进展。国内学术界经历了西方生态伦理学的著作翻译、思想介绍等本土化引入过程,形成了审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和谐的文明建设的生态理论依据。受此影响,部分学者深入发掘了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资源,形成了中西合璧、视域融合的生态哲学发展盛象。尤其是随着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发掘生态思想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在理论的逻辑发展中,关注现实中的生态问题、发展绿色科学技术、推进生态和谐的社会化建设形成了实证化的研究路径,为当代生态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中国化的现实境遇。

在这多元纷呈的生态哲学研究中,陶火生另辟蹊径,关注了生态实践的理论研究。生态实践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理论视角,通过对现存的生态问题的反思和对正在涌现的实践形态的分析,指出当代人们的实践方式正在经历生态学的转向,初步提出生态实践的内涵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实践从来不是无意识的活动,而是与人的意识和观念紧密结合的,因此,陶火生以生态实践为基础,研究了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生态理念,并突显出人地

共生的生态观,最终回归到现实的生态文明社会的建立和建设上,体现出生态实践的理论考察与实践活动的实际紧密结合。

在生态哲学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核心问题。人与自然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存在论的关系”,二是“实践论的关系”。在存在论关系中,自然界是人和一切自然物存在的基础,人和任何自然物只是自然界的普通一员,都依赖于自然界才能存在。在实践论的关系中,人以外的自然物是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它只有依赖于人的意识才能被规定,只有依赖于人的实践目的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生态实践的系统研究,是生态哲学的理论基础方面的重大理论创新。在生态实践观看来,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实践方式的弊端。目前,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追溯几乎全部地归咎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观念性态度,这意味着,当代生态观还没有从近代认识论哲学的遗风中走出。只有立足于实践论的生态观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的可持续性。能够真正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践方式是生态实践,本书对生态实践的概念内涵作出初步系统的理论解析。

陶火生是我的博士生,他在学习期间,始终把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的现实问题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理论出发点,既注重现实问题的理论探索,又注重理论问题的现实依据。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博士毕业以后,陶火生进一步深化了生态实践论研究,并且在复旦大学完成了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博士后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使本书的撰写能够奠定在更加雄厚的理论基础之上。

钱俊生

2011年10月于中共中央党校



目 录

contents

序	1
导 论 何以要提出生态实践观?	1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追问	4
二、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践根源	11
三、生态学时代的实践方式重构	15
四、本著的逻辑结构及主要内容	22
五、本著的主要研究方法	23
六、本著的创新之处	23
第一章 现代实践方式：问题与批判	24
第一节 现代实践方式及其问题	24
一、现代实践方式的历史性形成	25
二、现代实践方式及其基本特征	32
三、现代实践方式：现代社会问题的实践根源	35
第二节 对现代实践方式的历史性批判	39
一、马克思对现代实践方式的异化性质的批判	40
二、阿尔温·托夫勒对现代实践方式的分裂性质的批判	45
第三节 现代实践方式的生态批判	50
一、批判的理论基础：生态学科体系	50
二、批判现代实践方式的方法论体系	58
三、现代实践方式的生态批判	60
第二章 科学实践观及生态解读	69
第一节 科学实践观：内涵与基石	71

一、科学实践观的理论内涵	71
二、科学实践观:马克思全部理论的基石	80
第二节 生产性实践及生态解读	90
一、生产实践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90
二、生产性实践的生态解读	98
第三节 交往性实践及生态解读	102
一、马克思的交往性实践	103
二、交往实践的生态解读	111
第三章 生态实践观的思想考察	115
第一节 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实践观	115
一、中国儒学思想中的生态实践观	116
二、中国道学思想中的生态实践观	122
第二节 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生态实践观	125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实践观	128
二、生命平等主义的生态实践观	131
三、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实践观	136
第三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实践观	144
一、威廉·莱斯的生态实践观	145
二、本·阿格尔的生态实践观	147
三、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实践观	149
四、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实践观	151
第四章 生态实践的理论架构	155
第一节 生态实践的内涵与构成	155
一、生态实践的内涵	156
二、生态实践的三维构成	161
第二节 生态实践的基本特征	172
一、生态实践是师法自然的实践	173
二、生态实践是系统整合的实践	176
三、生态实践是互动优化的实践	178
第三节 生态实践的过程控制	181

一、确立实践目标:设计双赢的实践方案	181
二、依据目标的行动:对实践过程进行生态控制	185
三、检验实践结果:是否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188
四、修正原初目标:对实践目标的反馈调节	194
第四节 生态实践的基本规律	195
一、生态实践的效能规律:环境的优化与人的自我发展的统一 ...	199
二、生态实践的结构演化规律:实践的整体化与分化的统一	201
三、生态实践的创造性规律:二维继承性与实践创造性的统一 ...	203
四、生态实践的互动规律:能动发展性与生态整体制约性的 统一	206
第五章 生态实践与生态意识的辩证法	208
第一节 生态意识的内涵、实质与伦理自觉	208
一、生态意识的内涵	209
二、生态意识的精神实质	214
三、生态伦理学与生态意识的伦理自觉	217
第二节 生态意识的多元觉醒与实践生成	224
一、生态意识的多元化觉醒路径	224
二、生态意识的实践生成	231
第三节 生态意识对生态实践的反拨与生成	237
一、生态意识的内在观念驱动	238
二、生态意识的教育推动	240
三、生态意识的政策制度推动	243
第六章 生态实践观与经济社会发展	245
第一节 生态实践的经济多样性	245
一、保护环境的生态经济	245
二、高效利用资源的循环经济	249
第二节 生态经济实践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260
一、生态经济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	261
二、生态经济体现了作为“合题”的生态生产力	264
第三节 生态实践论的社会观念	271

一、关于生态社会的几种重要理解	272
二、建设生态和谐社会首要的是转变社会发展方式	279
三、建设生态和谐社会需要全面的变革	281
结 语	286
参考文献	288
索 引	296
后 记	299

导论 何以要提出生态实践观?

当下人类所面临的资源瓶颈和环境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随着工业化以来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资源和能源的使用量急剧增加,排向自然界的废弃物已经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容量,从而导致了自然界的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的现象,并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威胁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对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作出深刻的反思并力求真正解决问题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当今人们努力探寻的重要方向,以不同学科和理论背景为出发点的学者以及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对此孜孜以求、各自作出了伟大贡献。理论问题是对现实问题的观念性反映,现实的问题则是人们的实践产物。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由于人们的不合理的实践方式显得尤为突出,人们的健康生活在恶化的生态环境中也令人担忧。同时,在推动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过程中,一些新的实践形态、实践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对这些新的实践形态和实践观念作出总结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应尽的义务。因此,对现代实践方式作出认真的研究,既是揭示生态问题的本真根源之所在,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前提。

从人类发展的整体性进路来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从自然获得资源和能源,并把废弃物排放到自然中,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自然并不只是人类实践的“水龙头”和“污水池”。生态问题是人在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所引起的生态系统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的破坏,包括资源匮乏、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等方面,是当代人类发展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直接关乎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由于人们排放到环境中的(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超过环境的

承载能力而无法自然降解,自然环境遭到了日趋严重的污染。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人们为了发展经济就大肆开采自然资源而不顾资源所在地的生态破坏,由此导致资源的匮乏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人们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资源的掠夺,导致地域性乃至整体性的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运动结构遭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引起生态系统的失衡。人类社会实践能力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人们开采的自然资源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在追逐利益的驱动下,人们为满足需要而采取滥采乱伐的实践方式;另一方面人类排放的废弃物超过环境承载容量而难以迅速降解,从而导致当代人类遇到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资源环境问题)。甚至,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生态恶化的这种状况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对自身的实践方式、发展方式和发展观念作出根本改变,“有朝一日,它会压倒世界范围的发展力量,导致经济的衰落。”^①生态问题的累积不仅会引起经济的衰退,也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环境的污染导致人们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资源的匮乏导致发展的可持续性缺乏支撑,环境问题的转嫁则导致国际关系和区域关系矛盾重重。因此,我们需要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努力协调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正处于迅速发展中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遭遇到了资源、环境、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发展令国人自豪、使世界瞩目,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的发展既存在发展不足而要深入全面地发展经济,又存在发展的资源瓶颈严重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发展不足是因为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程度显得不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等仍需提高,然而,由于不合理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大量开采、大量使用、大量浪费的资源使用方式,为日后的发展埋下巨大的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人们大量而肆意地开采自然资源,市场经济的“外部不经济性”在资源利用的生态向度面前暴露无遗。同时,工业污染对人们的生存环境造成极

^① [美]莱斯特·布朗著:《生态经济》,林自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大的威胁,生活垃圾得不到妥善处理形成了垃圾围城的尴尬局面,废弃物的随意排放严重地污染了环境。

目前,中国发展中的生态问题呈现出“复合性”、“压缩性”的特点,体现了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变与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尽管人们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努力,但是,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环境状况和自然资源的持续匮乏仍然是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如果一味地在量上扩大经济增长规模,继续走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浪费的传统线性发展道路,我们的发展就难以挣脱资源匮乏、环境承载力有限、资源消耗过大的“瓶颈”。在这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考察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运行曲线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是否具有普遍性,这很值得思考。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提出假说,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一开始随着经济发展而加大,到达最大值之后,差距开始缩小。如果以人均收入为横坐标,表示经济增长,以收入差距变化为纵坐标,库兹涅茨假说呈现倒“U”型,这就是经济学的库兹涅茨曲线。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概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试图描述污染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它假定,如果没有一定的环境政策干预,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增加而恶化或加剧;当该国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以国民的经济收入超过一个或一段值为标志)时,环境质量的恶化或污染水平的加剧开始保持平稳,进而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继续增加而逐渐好转。即:在国民的经济收入(例如人均 GDP)达到转折点之前,经济收入每增加 1%,某些污染物(例如大气中的悬浮微粒、 SO_2 浓度)的增加幅度会超过 1%;在转折点之后,某些污染物的下降程度会超过收入的增长幅度。如何根据各自的数据来源估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的具体数值,引起了诸多环境经济学家的关注。以大气环境质量为例,从污染物存量的角度,有人估计大气中 SO_2 浓度的转折点在人均 GDP(1985 年美元) 4 000—5 000 美元,或在低于 8 000 美元时发生转折;另有人估计,大气中 SO_2 和悬浮微粒浓度的转折点分别为人均 GDP(购买力平价) 3 670 美元和 3 280 美元。与此不同的是,从污染物流量的角度,有人估计 SO_2 和悬浮微粒人均排放量的转折点分别发生在人均 2 900

美元至3 800美元之间和人均4 500美元;还有人估计上述两种人均排放量的转折点应发生在人均GDP超过8 000美元(1985年美元)之处。^①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或拐点是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时环境状况发生变化的临界点。改变这种状况的尝试在于根本转变发展方式——以发展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实践方式。实际上,发达国家以及世界上部分发展比较快的一些国家,曾经采用过的发展方式就已经在资源与环境问题上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入了一条死胡同,那种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用新的发展方式把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进行有机整合,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对当代中国的发展而言就显得尤为必要。新发展方式的哲学基础就在于建构新的实践方式和实践观念,对现代实践方式的批评和解构必将推动新的实践方式端倪渐现、展露荷尖。

因此,无论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层面,还是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特定层面来说,追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以及寻求根本救治之道是人们解决现存问题的首要环节。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追问

对生态问题的觉醒和反思,以及寻找出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提出各自的救治方案,在西方国家已经持续进行,并获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根本解决当代中国的生态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此外,我国学者也从各自的研究视域和学术背景出发,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发展背景,对生态问题的现状提出了诸多批评和改变现状的积极建议。

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归因探索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任何单一的原因都不能导致当今如此积重难返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认识论哲学的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传统忽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性和独立性,认为自然外在于人类社会;生态神学认为基督教对生态环境问题有着不可推卸的精神教化的责任;生态伦理学认为传统的伦理观念仅仅强调人伦道理,忽视了人地伦理;技术根源观认为

^① 参见张晓:《中国环境政策的总体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生态环境问题在于一方面是技术发展的不足,另一方面是技术的滥用;把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与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和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紧密联系则是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观的偏向;生态政治学认为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制度性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根源是制度的失败,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有赖于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完善相关的制度,环境问题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这些根源探索在一定的程度上深化了人类对自身发展方式的反省,另一方面也推动人类选择新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和文化意识。对生态问题的觉醒和反思,已经获得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人们力图寻找出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提出各自的救治方案,这些认识可以归纳为三种主导性的观念。

1. 文化——人类中心主义

一种观点认为,生态问题归因于人类现代文化,因此要对人类的文化进行革新。针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尘暴(在这里,尘暴更是一种生态灾难的隐喻),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指出,“真正的原因在于形成他们那种价值观和行为的特殊的文化”,“文化正是造成尘暴的主要原因”,因为“现代西方人的文化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人的本质是自为的”。^①人的自为本质表明人始终从自身的目的去改造和征服自然。此外,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也指出,“西方的主流文化认为,人是为了自身的目的才征服并控制自然的。”^②人的自为本质的典型形态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1967年,怀特(Lynn White)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怀特把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正统基督教对于自然的傲慢”。此种“傲慢”植根于《创世纪》中的那种蛮横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③他认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和后来培根式的人利用科学技术来统治自然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这一观点在《自然的控制》中

① [美]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蕙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页。

② [美]欧文·拉兹洛著:《决定命运的选择》,李吟波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7页。

③ 《圣经·创世纪》1章28节。

也得到回应,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指出,“只要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就在一种更广泛的道德框架中解释人是地球主人的观念。”^①在这里,地球主人之称意味着人以自为文化为根本目标。此外,米哈依罗·米萨诺维克和爱德华·帕斯托尔则把人的主观愿望作为危机的原因,认为“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危机其发生的根源不同于过去的危机。过去的危机主要由天灾人祸等客观原因所造成。这些原因有外族入侵、瘟疫、洪水、地震等。与此相反,当前的很多危机是由主观原因造成的,而且往往起源于人们最美好的愿望”^②。但是,人们的主观愿望不过是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观念的代名词,它所根植于其上的还是现代的文化观念。我国学者探讨生态问题的归因时,也不乏此类观点。黄志斌认为,“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和价值层面的危机,其根源在于人……人对自然的主宰征服观支配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方面的缺陷。人类只有确定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消耗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的自我中心观念形成了现代文化传统,成为价值观念的重要支点,驱使人为了自身的目的、运用理性的力量去控制和改造自然。

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的文化主流,现代各种文化形态的思维背景实质上奠基于理性主义之上。在理性主义的视野中,人是理性的存在,理性是人的本质,是评判事物的“最高的法官”。在理性的逻辑中,人的理性是万能的,理性的人是自然的“上帝”,人的力量的增长就是理性的胜利,人通过理性能力开始战胜自然,把自然置于被认识、被改造的客体的位置。在理性的支配下,“我们对自然的认识比较精确了。”^④对自然的精确认识导致人们产生控制自然的观念,“对自然的认识导致人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决定性的根本变化,而且还是直接地、不把运用技术作为中介。”^⑤理性在精确认识自然的同

① [加]威廉·莱斯著:《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② [美]米哈依罗·米萨诺维克、[联邦德国]爱德华·帕斯托尔著:《人类处于转折点——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刘长毅等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③ 黄志斌著:《绿色和谐管理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④ [德]汉斯·萨克塞著:《生态哲学》,文韬、佩云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⑤ [德]汉斯·萨克塞著:《生态哲学》,文韬、佩云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时,也充分实现了人的自我中心观念,这是现代西方文化的砥柱。其后果就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不断膨胀,导致了人们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自在运行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基于这种缘由,生态问题的解决在于现代人类文化的根本转变,正如拉兹洛所说的“正在出现的文化转变则唤起人们注意,人类是地球上生物圈中的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自然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①。有机论的文化观念在这里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同气连枝。但是,在享受现代文化的成果并以之为“巨人的肩膀”来发展当代文化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盘否定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吗?文化是人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产物,是人的认识和实践的成果,传统文化的转变是人们认识转变的重要内容,问题在于改变现存的生态问题就是现实地改变世界的活动。因此,这种归因由于缺乏实践根基的理论视界而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思考。

2. 工业化——技术控制论

一种观点认为,生态问题归因于近代以来的工业化,主张倒退到经济的零增长。1972年3月,米都斯(Dennis L. Meadows)领导的一个17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篇研究报告,即《增长的极限》。他们选择了5个对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参数: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污染。这项耗资25万美元的研究最后得出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地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这一结论。这一理论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不言而喻,这种增长是工业文明发展的标志。工业文明是人的智慧和力量的爆发,也是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充分实现,“总之,通过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得以体现,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宿愿变成现实,他们真正成为自然的主宰。这就是人类引以自豪的工业文明。”^②就是这种“实利性的工业文明,不仅把人类引入唯物主义歧途,导致人性的扭曲和社会的变态,而且造成了危及人类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使人类面临严峻的挑战”^③。在工业文明阶段,“工业化和现代化凯

① [美]欧文·拉兹洛著:《决定命运的选择》,李吟波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7页。

② 蔡拓等编:《当代全球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③ 蔡拓等编:《当代全球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